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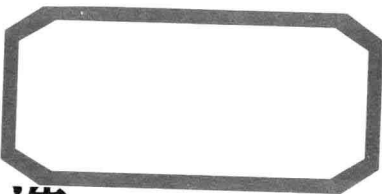
合众读书馆

阅读年选



上海图书馆 编

合众读书馆



阅读年选



上海图书馆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阅读年选. 财富·2012 / 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439-5643-8

I . ①阅… II . ①上… III . ①经济—文摘—中国 IV .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1827 号

责任编辑: 张 树 王卓娅

美术编辑: 徐 利

阅 读 年 选

财 富 · 2012

上海图书馆 编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650 × 900 1/16 印张 18.5 字数 263 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9-5643-8

定价: 28.00 元

<http://www.sstlp.com>

编 委 会

主任:吴 敏

编委:杜建平 吉 佳 李以璐 唐良铁

许圆德 张晓奕 张 轶 张元蓓(按拼音排序)

敬告作者

在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上海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为了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阅读功能,为读者留存一份2012年的阅读档案,编辑了这套“2012年阅读年选”丛书。在图书出版后我们将及时向每位作者支付稿酬和样书。如果您在看到本书时还没有收到样书和稿酬,希望您及时和我们联系。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联系人:李 莺 电话:021-54035570

王卓娅 电话:021-54051662

编 者

2012年岁末

目录

CONTENTS

- 1 | 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 林毅夫
- 10 | 理念决定未来 ··· 张维迎
- 16 | 中国经济:稳增长背后的风险 ··· 陈和午
- 22 | 危机下的中国经济 ··· 李稻葵
- 28 | 谁来拯救我们 ··· 许小年
- 35 | 周其仁:面对中国经济,有的时候心肠要硬一点 ··· 李 勇
- 41 | 十问中国税改——中国呼唤减税行动 ··· 魏雅华
- 49 | 一叶知秋,看中国经济转型 ··· 万 黎
- 53 | 林毅夫:持续增长之路 ··· 叶伟强 霍 侃
- 65 | 张维迎:中国经济的前途在民间 ··· 张璐晶
- 70 | 寻路新经济 ··· 牛禄青
- 78 | 低碳经济更多靠市场 ··· 牛华勇
- 82 | 中国楼市的中长期趋势 ··· 李 骁
- 87 | 房地产:房子不是用来住的 ··· 牛 刀
- 93 | 江湖之远说汇率 ··· 屈腾龙
- 99 | 如何应对新兴市场货币贬值 ··· 熊爱宗

- 104 | 朱民:人民币国际化走的是“创新模式”... 龚瀛琦
- 109 | 不仅是降息... 谢 九
- 114 | 通胀远去了吗... 王 军 刘向东
- 120 | 中国经济是否进入通货紧缩时期... 李佐军
- 124 | 难以稳住的物价... 智 强
- 128 | 茅台的涨价符号... 黄雅琦
- 135 | 公务员涨工资的尴尬... 张墨宁
- 140 | 股市:主人被绞杀... 李 彤
- 146 | 20年后,拿什么拯救养老危局... 李秀江
- 150 | 备战养老金... 左 林 莫 莉 王晓璐 刁晓琼
- 164 | 养老:“税延”能否跑赢通胀... 任蕙兰
- 170 | 三代人的“养老经”... 贾立君
- 174 | 趋势投资大师拉斯·特维德:危机烟雾下的三大投资主题... 辛云飞
- 180 | 值得关注的四大类全球投资... 张 蓓 陈 伟 杨 森 辛云飞
- 187 | 海外收购:陷阱还是馅饼... 刘晓蓝
- 194 | 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贵吗? 投资抵御涨价的生活... 马 力

- 198 | 收藏家时代 ··· 邱家和
- 205 | 贵金属收藏:火热珍品冷静藏 ··· 郑鹏远
- 208 | 2012 理财,我拿什么拯救你 ··· 袁 元
- 213 | 存钱未必存银行,四种理财方式可选择 ··· 汪敏华
- 217 |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指数基金 ··· 廖 佳
- 221 | 新婚理财必读 ··· 郭建杭
- 225 | 小两口的六大理财秘籍 ··· 云 中
- 229 | 财商传承,普通家庭也该做 ··· 张 蓓 郭建杭 陈 伟 辛云飞 黄 埔
- 233 | 花钱的同时如何省钱 ··· 苏曼丽 吴 敏
- 237 | 微机会 ··· 白 灵 唐 婷 任忠君
- 263 | 吕长城:草根造富记 ··· 刘 岩
- 269 | 华人巨富如何赚第一桶金 ··· 天空蓝
- 280 | 婚恋网站:幸福也是生产力 ··· 李 好 苏劲松

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 林毅夫

日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主题讲坛上发表了重要演讲,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世界的贡献作了总结,对中国改革所采用的“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方式”作了分析,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进行了科学的推论——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迎来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林毅夫说。“从经济角度来看,1978年,按照当时的美元汇率计算,我国的人均收入是182美元,相当于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1/3(他们当时的人均收入是500多美元)。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连续32年平均每年以9.9%的速度增长。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么长的时间,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取得这样的成果,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经过32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规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时候达到4370美元,跨过了高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现在的人均收入已经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4倍左右。同时,我国成了“世界工厂”,是最大的出口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很多,对此林毅夫同样有着切身体验。“1987年我从芝加哥学成回国。当时为了吸引从海外学成回国的人才,国家有不少优惠政策。我记得很清楚,按照优惠政策,当

时我可以免税带‘八大件’回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还有四个电风扇，这些都是当时国内非常紧俏的商品。”

这些年，不仅城里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包括农村的生活水平也获得了大幅度提高。世界银行有一个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一天一美元的贫困线。按此标准，我国在过去 32 年当中有 6 亿人摆脱了贫困。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联合国有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它的第一项目标就是希望在 2015 年，全世界的贫困人口总数较 1990 年，减少一半。其实，中国已经通过自身努力使联合国这项目标在几年前便完成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经济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林毅夫举出了 1998 年东亚金融危机的事例：“当时大家普遍认为，东亚经济至少得一二十年才能够缓过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避免周边的经济出现竞争性贬值。众所周知，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经济要复苏就必须启动内需和外需——东亚经济一般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它们的产品跟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相竞争，在危机冲击之下要想复苏，一方面要增加国内的内需，但对它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增加外需；如果人民币贬值，中国产品增加了出口竞争力，就会占领东亚诸国产品的市场，它们为了增加竞争力，就可能相继贬值，这就会出现所谓竞争性贬值，加剧经济动荡，这样对大家都不好。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没让人民币贬值，避免了出现竞争性贬值的不良后果。同时，在 1998 年到 2002 年那段时间里，我国维持了 8% 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增长速度，拉动了东亚经济的复苏。东亚经济在危机之后的两年就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最大贡献来自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币不贬值政策。”

而在处理从 2008 年开始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方面，中国同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面对这场自 1929 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崩溃而引发的整个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冲击，中国政府迅速地采取了 4 万亿人民币的积极财政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在 2009 年第一个季度就开始复苏，而且维持 9%、10% 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同样成为这次全球经济复苏最重要的拉动力，这

也是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

上述成就都是大家未曾意料到的,因为国外媒体、学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一直在预测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崩溃。虽然到 90 年代末,中国经济已经有了 20 年的快速增长,然而,直到 2001 年还有一本在世界上非常畅销的书,叫《中国崩溃论》。那本书当时在国外的书店、飞机场的书摊都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但是从 2001 年到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仅未减,反而加快:从 1978 年到 2000 年,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 9.7%;而从 2000 年到 2010 年是 10.5%。

“这样的成绩也许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自己也没想到。改革开放初期,他提出的目标是中国经济 20 年翻两番。”林毅夫当时还是北大研究生,为了知晓 20 年翻两番平均每年需要增长多少。他花了整个下午的计算得出,20 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 7.2%。当时的他认为那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因为经济学有一个叫“自然增长率理论”,用一个漂亮的数学模型和历史实证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后,或者遭受自然灾害的破坏以后的经济复苏可以达到 7%或稍高一点持续增长几年,长期以每年超过 7%的速度增长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他认为小平同志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政治家,借助“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乎其下”的古训,故而要把目标定高一点,才能鼓舞全国上下为那个目标去奋斗,即使没有达到 7%,达到 5%、6%也不错。而面对如今的成就,他发现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以 7.2%的速度增长 20 年的目标不仅达到了,而且还超过了;不仅 20 年,现在已经持续了 32 年,每年平均 9.9%——如果每年以 7.2%的增长速度,32 年后我们的经济跟 1978 年比只增长了 9.2 倍,现在是每年 9.9%,32 年以后就是 20.5 倍。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未能有同样的成绩?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进行改革开放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未能取得同样的成绩?跟 1978 年相比,我国确实进步了很多,但是,美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是 5 万美元,我们还只

有它的十分之一,就算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也只不过就是美国的 20%,所以跟发达国家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只有维持较高速增长,才能赶上发达国家,但是,这样高的增长速度还能维持多久?

面对这些问题,林毅夫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首先,林毅夫谈到,为什么 1978 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 32 年以 9.9% 的速度增长。高速增长是在 18 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文明现象。按照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在西方世界,18 世纪以前,平均每年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只有 0.05%。也就是要 1 400 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够翻一番:那时,其实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当时一个人的预期寿命不过是三四十岁,就是活七八十岁,也看不到任何经济的进步。进入 19 世纪以后,突然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增加了 20 倍,从每年只有 0.05%,变成每年 1%,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这样的速度,只要 70 年的时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了。进入 20 世纪以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又增加了一倍,从每年只有 1%,变成每年 2%,这样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就减为 35 年。到 20 世纪,西方国家一般人的预期寿命可以达到 70 岁,也就是说在一个人有生之年收入就可以翻两番了。从 1 400 年变成 35 年,这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的速度还在加速?原因在于 18 世纪出现了工业革命,导致技术的发明、创新、升级的速度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也不断从附加值低的农业转变到附加值高的制造业、工业、服务业。这样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成为人均收入提高的物质基础。

工业革命以后的技术变迁产业升级是让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最主要的驱动力。前面提到十八世纪以前中国领先于全世界,可是一百年的时间不到,中国就从世界上拥有最鼎盛文明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原因并不是中国退步了,而是其他国家进步太快。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而中国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要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经济才能翻一番,于是就落后了。

但如果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那落后国家

实际上是有一个优势的。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产业、技术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都必须来自自己的发明。发明需要的投入非常大,而成功概率却非常低。根据研究,前沿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平均 100 项投入到最后只有 5 项技术能过关,可以去申请专利;而在申请专利的技术中,真正有商业价值的实际上只有一项。当然这一项专利可以有全世界的市场,回报会很高,可是那 99 项都像打水漂,有去无回。而发展中国家现在采用的技术和产业与发达国家有差距,这个差距就是经济学上的后发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后发优势,也就是采用在世界上现成的、成熟的但比自己现在好的技术来进行创新,创新成本就会非常低。因为这些技术有很多是过了专利保护期的,即使还在保护期内,一项技术只要超过 10 年,拿来用基本就不用付专利费了。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创新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得多。

根据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共有 13 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及香港地区,还有其他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取得了每年 7% 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持续了 25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迅猛的增长态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

但是,后发优势一直都存在,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取得这样的成绩呢? 这跟发展战略有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追求国家民族的复兴,推翻了清朝政府,经过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认识到如果没有军事工业,就没有国防产业,没有国防产业就要挨打,而军事工业是重工业,所以 1953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思路,希望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基础之上,建立一个现代的、先进的重工业体系。这个目标非常伟大,但是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当时的重工业产业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产业一般都有专利保护,要使用需要付很高的专利费,更重要的是那些先进产业普遍被认为和国防安全有关,即使愿意付钱买,人家也不见得愿意卖,因此,必须自己搞研

发,付出的成本至少跟发达国家一样,甚至还要高,因为他们的基础比较好。

第二,这些产业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当时是个农业社会,资本相对稀缺,资金的价格按照市场来定比较高,而这种先进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成本中最重要的就是资金、资本的价格。如果在一个开放的市场里,这些企业没法跟发达国家的重工业企业竞争,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以低利率、汇率的保护和补贴才能存在。而且,重工业需要大规模资金的投入,中国当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体,大部分生产活动在广大的农村,剩余非常少,只有靠政府以工农剪刀差的方式来动员以投资于重工业。

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有它的成绩——在60年代制造出原子弹,70年代卫星上天,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资源的配置严重错位。应该讲,中国当时的劳动力非常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得不到资金来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七八十年代初期民生日用产品非常短缺。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改变了发展战略,让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快地成为了“世界工厂”。比如现在的计算机产业、手机产业等高科技产业,国内做的其实是劳动密集的加工区段,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也就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就可以创造利润;有利润就可以搞投资;投资以后,资本就增加了,比较优势就变了——从劳动力极端密集逐渐地变成资本相对密集。在这个转变升级过程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这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我国能够发展得那么快,而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取得快速发展的原因。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能够利用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这么快的原因,那为什么其他的转型中国家,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很多非洲国家,不能取得同样的成绩呢?问题的根子其实是一样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推行“斯大林模式”,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都是在相对落后的机制上发展现代产业。所以它们的计划配置产生的问题跟中国是相同的。

二战以后,即使资本主义阵营中的发展中国家,同样根据当时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去推行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是20世

纪40年代以后出现的,当时发展经济学只看到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差距,即发达国家占优势的产业是先进的重工业,发展中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是落后的农业和自然资源产业,于是就给发展中国家建议应该去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它们出现的问题也跟中国一样,很多的扭曲、政府干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积极性受到抑制等。

中国从1979年开始进行改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也都从80年代纷纷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但是到2000年的时候,回顾一下1960年到1980年,以及1980年到2000年这些国家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它们在后面的20年,也就是1980年到2000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比1960年到1980年的增长速度还慢,不仅是平均增长速度慢,而且经济的波动更大、风险更大。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连续32年的快速增长,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慢了,而且危机不断、发生频率更高呢?这跟它们推行所谓“华盛顿共识”有关。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很多扭曲,和发展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去建立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的思路雷同,“华盛顿共识”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推行发达国家的制度,就是推行理想当中的市场经济制度:全盘私有化,把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自由化,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化,资源由市场配置、价格由市场决定;以及后来的稳定化,也就是政府的预算应该平衡,采用稳定的宏观政策,不应该再去补贴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事与愿违,因为“华盛顿共识”只看到经济中普遍存在的扭曲,而没有看到扭曲的根源。5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中那么多的计划干预、那么多的扭曲,都是为了保护那些在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体系里面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把那些靠扭曲来实现的保护、补贴一下子都取消掉,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就要全部倒闭,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社会和政治就不稳定,没有稳定当然不能发展。绝大多数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一方面为避免出现这样的社会经济后果,同时,也认为这些产业是先进的、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产业,因此绝大多数的政治家和人民不愿意让它们倒闭。所以,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这些国家也引进了很多其他更为隐蔽的扭曲、

保护和补贴,这些措施所花的钱在很多情况比原来花的更多。如俄国的重工业现在变成由8个寡头集团所掌握,现在给这8个寡头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所花的钱,比没有推行20世纪90年代初的转型政策之前花的钱还多。

为什么呢?当时对此问题的争论就已经相当激烈。林毅夫对此有着自己的观点:因为那些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把它们私有化以后,私人老板绝不会为了国家的强盛而自己掏腰包来补贴它们。私人资本家只是逐利,不赚钱的事不干。私有化之后这些私人资本家会利用这些企业没有自生能力作为借口来跟国家要保护补贴。当它还是国有财产的时候,单位经理人员都是公务员,公务员可以以此理由索要保护补贴,但拿了钱不能放在自己口袋里,否则就是贪污、犯法。但私有化以后,要得越多,放在自己口袋里越多,天经地义。所以私有化以后的保护补贴会比在国有时期的保护补贴多。

中国为什么既避免了像苏联、东欧那样崩溃,又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快速增长?林毅夫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采取了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方式。对于原来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重工业部门,知道它们没有自生能力,需要保护补贴,承认这个现实,继续给它们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同时,引进一些提高生产积极性的利润留成、包干制、股份制,只要经营得好,他们的收入就可以高些。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另外,对具有比较优势、原来受抑制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实行开放政策,鼓励民营经济、三资经济进入。这些新的部门由于符合比较优势,所以发展非常快,于是资本积累就非常快。资本积累以后,比较优势得到提高,许多在五六十年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变得有自生能力,可以与其他国家的产业竞争了。同时,改革后的快速发展给国家创造了很多资源,可以用来补贴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使整个经济平稳地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型。

林毅夫说,这些都是过去的成就,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快速增长还能维持多久。这要看技术的差距,也就是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技术差距本身表示中国相对落后,但是这也是一个资源。一个好的衡量指标就是人均收入水平,尤其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的人均收入水平。因为人均收入水平代

表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劳动生产力反映的就是技术和资本的使用量。

目前最新的可以做跨国历史研究的是 2008 年麦迪森教授的数据。2008 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当年美国的 21%,日本在 1951 年、中国台湾地区在 1975 年、韩国 1977 年也都是美国的 21%。日本从 1951 年到 1971 年的 20 年间,经济年均增长 9.2%;中国台湾地区从 1975 年到 1995 年的 20 年间,年均增长 8.3%;韩国从 1977 年到 1997 年的 20 年间,年均增长 7.6%。他们都发挥了比较优势,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同样采用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日本可以维持 20 年以 9.296% 的速度增长,中国台湾地区可以维持 8.3% 的速度,韩国可以维持 7.6% 的速度,那么中国在 2008 年以后,也应该有再维持 20 年以平均每年 8% 的经济增长率的潜力。

林毅夫指出,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不断地根据科学发展观提高我们的产业、技术水平,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发挥后发优势,再维持 20 年平均每年 8% 的增长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经过 20 年的快速增长,日本从人均收入为美国的 21% 变成 1971 年为美国的 65.6%;中国台湾地区从 1975 年的 21% 到 1995 年就变成美国的 54.2%;韩国到 1997 年时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计算也达到美国的 50%。也就是说,如果我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维持每年 8% 的增长速度,到 2030 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至少可以达到美国的 50%,因为我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 4 倍多。如果到 2030 年人均收入是美国的一半,那我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或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至少跟美国相当。

2030 年以后,和代表最先进国家的美国相比,我们还可以继续运用后发优势维持较高速的经济增长。当然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一半,就相当于现在韩国和美国的差距,那时很多行业已达到世界先进的水平了。到时候我国需要多一点自主研发,这是一个从引进到自主研发的转型。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可以看好的。

(选自《上海经济》)